

郭沫若“为新政协催生”

黄华春



▲许广平(左一)、沈钧儒(左二)、郭沫若(右一)、罗淑章(右三)、李德全(右四)等民主人士离开沈阳前在火车站合影。

1949年9月21日至30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平胜利召开。在新政协会议酝酿和筹备过程中,郭沫若做了大量工作“为新政协催生”。

“为建新中国”而积极奔走呼号

1947年11月,党组织安排郭沫若来到香港,领导中国学术工作者协会和中华全国文艺界协会香港分会工作。此时,香港聚集着大批民主人士和文化人士,郭沫若非常清楚自己身上的政治责任,对于党的号召和指示,总是坚决贯彻执行。他不辞劳苦地出席各种政治活动、撰写文章、发表谈话,“为建新中国”而积极奔走呼号,作舆论准备。

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发布了“五一口号”,郭沫若于5月5日与李济深、何香凝、蔡廷锴、谭平山等12人联名致电中共中央,表示坚决拥护这一伟大号召,认为当前筹备新政协会议“密合人民时势之要求,尤符同人等之本旨”;同时致电国内外各报馆、各团体,呼吁“全国人士自宜迅速集中意志,研讨办法,以期根绝反动,实现民主”。

5月8日,郭沫若应《华商报》编辑部之邀,出席“目前新形势与新政协”座谈会。会上,郭沫若首先发言,他详细阐述了“五一口号”的重大意义和新政协的性质及召开的原则,第一次提出了中共中央在新政协的领导权问题。

他说:“中共中央五一的号召对于促进民主团结,促进胜利,具有历史意义。”“正切合目前人民的需要。”“对于什么人来召开的问题,我坦白表示我们应请中共召开,实际上中共在中国革命战争中,居于领导地位。”各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必须坦白承认中共的领导权,坦坦白白承认毛泽东先生为中国人民领袖,承认新民主主义为今后中国建国的最高指导原则。”“今天民主党派民主人士的工作就是坦白地促进全面的胜利。举凡对于人民革命有必需的事,为中共所不能说,不便说,不好说的就由我们说出来。人家害怕中共,我们就向他说明中共可亲而不可怕。人家说中共要坚强领导,未免太骄傲,我们就说中共事实上在替我们打冲锋。”表示“自己就不怕做尾巴,也不怕人给我一顶红帽子。做尾巴,戴红帽子我倒觉得非常光荣”。

他还呼吁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或无党派人士,在讨论中共“五一口号”时,不要把第五条口号孤立起来,而是要整体去考察,此外,还必须把毛泽东先生的文告、双十节宣言、土地法大纲、工商业政策等一齐研讨。只有经过这样一段时期的酝酿研讨,才能得到一个共同的意见,到那时,新政协召开的时机也就成熟了。

“冬天来了,难道春天还会远吗?”

5月20日,郭沫若发表了长达一万余字的《为新政协催生》,在文中,他对新旧政协的性质、组成成分和任务进行了详细的对比,说明了它们本质上的不同,他指出“新政协的本质是以新民主主义为它的指导原则”“是面向着要以人民为主的真正民主”。新政协是“向帝国主义、封建主义、买办资本主义宣战的”“是革命性的产物”。新政协的任务是“重新建设新政府”、拟定和平建国《共同纲领》《宪法》草案、《人民代表大会组织条例》等。并号召大家努力支援前线,扩大宣传,“以大无畏的精神响应中共的主张,研究毛泽东的思想,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

郭沫若还通过多种形式,热情呼唤新中国的诞生。在1948年端午节,郭沫若联络在港诗人领衔联名发表了《我们的话》,欢呼“全国范围的革命胜利就要到来,在亚洲大陆上,一个新的中国就要诞生”;表示“在这大风暴的日子,大解放的黎明,作为一个诗人,他不仅要带着他的歌唱来参加人民革命的行列,而且更要带着他的为人民服务的点滴实际工作,来共同创造人民大解放的史诗”。他憧憬着明年端午到南京或北平去纪念诗人节。1948年11月初,郭沫若应邀到香港南方学院演讲,他讲述解放战争胜利发展的形势,情绪激昂,热血沸腾,到后来,完全是在朗诵诗篇:

“新中国在东方喷薄欲出了。建设新中国的神圣职责,落在年轻人的肩上。同学们!希望你们爱祖国,爱学习,学知识,练本领,为伟大的祖国贡献力量。”

“冬天来了,难道春天还会远吗?让我们举起双臂,欢呼新中国的春天的来临吧!”

根据中共安排,郭沫若作为第二批北上民主人士,化名“丁汝常”,于1948年11月23日夜离港北上,他“决心摒除一切的矜骄,虔诚地学习、服务,贡献出自己最后的一珠血,以迎接人民的新春”。与他同行的还有马叙伦、翦伯赞等30余人。这次北上是一次秘密行动。为了北上人士的安全,郭沫若放了一个烟幕弹,他从8月25日起,在《华商报》副刊连载《抗日战争回忆录》,每天一篇,本来是随写随发,得到北上的确切时间后,他赶写了七八篇文章,预先交给报社,给人以自己没离开香港的假象。《抗日战争回忆录》于12月5日连载完毕,此时他们已进入东北解放区。

将此身“慷慨付人民”

1949年2月25日,郭沫若与李济深、沈钧儒、马叙伦等35人从沈阳乘火车赴北平后,作为无党派民主人士代表,特别是作为教、科、文诸界别的无党派人士的领军人物,开始正式介入到新中国的策划和筹建中,他乐此不疲地参加各种会议、访谈、聚会,将此身“慷慨付人民”。

6月中旬,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召开。郭沫若代表无党派人士讲话,盛赞新政协,强调“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在毛主席所提倡的新民主主义的照耀之下,我们将要永远走着上坡路,而永远不会下降了”。他是筹备会无党派小组的召集人,在多次小组会上,“折冲于各位代表之间,灵活地而

又坚定地贯彻党的方针和主张”,为日后政协会议的正式召开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会议闭幕时,他被选为新政协筹备会常务委员会副主任。常务委员会下设6个小组:其中第5小组负责起草新政治协商会议的大会宣言,组长是郭沫若、副组长是陈劭先;第6小组负责拟定国旗国歌方案,郭沫若是第6小组16名成员之一。

当年7月,筹备会登报公开征求国旗、国徽图案及国歌歌词。启事中提出应注意中国特征的要求,就是采纳了郭沫若的意见。现存的许多应征稿件上,都有郭沫若写的具体意见。他还身体力行,设计了一面国旗,写了《新华颂》作为国歌应征稿;在《义勇军进行曲》初步确定为国歌后,又被大家推荐改词。在征集、筛选、设计和确定新中国标志的过程中,郭沫若全力以赴,费尽了心力。对后来国徽图案的设计,郭沫若就图案上方谷穗相接的缺口如何处理提出应表现“金瓯无缺”的设计思想。设计者十分重视这一意见,将缺口设计为宝瓶口,下衬以完整的金环。现存的国徽图案稿上有一行小字:“郭老已看,说‘金瓯可喻金瓯无缺’”。

在新政协会议筹备会召开之际,郭沫若接受《人民日报》记者采访,表示“我们一定要诚恳地接受中共坚强的领导,在毛主席的旗帜下,勇敢地向前进”。

1949年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召开。会议第4天,郭沫若作为领衔提案人,和李济深、沈钧儒、黄炎培、马叙伦等44人联名向大会秘书处提交了提案《请以大会名义致电联合国否认国民党反动政府代表案》,这件提案代表4亿多中国人向世界宣布: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是真正代表中国人民意愿的会议,由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产生的中央人民政府是中国唯一合法的政府,国民党反动政府无权代表中国人民。这件提案在国内外产生了重大的政治影响。

在第5天的全体会议上,郭沫若作为无党派民主人士首席代表作了发言,表示坚决拥护《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并说:“我们是无党派民主人士,但我们绝不是美国帝国主义所企图引诱的‘民主的个人主义者’……我们是民主的集体主义者,我们也绝不是自以为站在中间路线上的所谓‘自由主义者’,但我们确实是相当自由的,而且自由到了这样的程度:我们要自由自由在地跟着毛主席向一边倒。我们在国内要自由自由在地倒在中国共产党的一边,拥护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的一切号召,拥护中国人民解放军,拥护以工人阶级为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

9月29日,郭沫若前往颐年堂毛泽东住所,与毛泽东、周恩来、李立三、李济深、沈钧儒、黄炎培、陈叔通8人一起,讨论修改毛泽东主席自拟的就职公告稿。10月1日,郭沫若与国家领导人一起登上天安门,参加了自己为之奋斗了一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

(作者为四川省乐山市沙湾区政协副主席)

董亦湘倡导研究孙中山

周二中

1925年3月12日,伟大的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逝世。如何继承孙中山先生的遗志,这是摆在国共两党面前的一件大事。以董亦湘为代表的共产党人不仅参加了对孙中山先生的追悼活动,在追悼会上发表演讲,同时,在继承孙中山先生遗志方面更是身体力行不遗余力。

当年4月24日,也就是孙中山先生逝世一个月后,《民国日报》觉悟副刊发表了一篇很独特的文章,题目是《发起孙中山主义研究会征求同志》。这是董亦湘等共产党人牵头发起的。

征求函正文不到700字。开篇分析了当时的国内外形势:“现在西方被兵的乡村还充满着兵烟;流离的老小还是四方飘浪着;而东方底战鼓,又已越敲越响了。虽然现在表面是一个和平局面,可是我们的劳动者,一方面要弥补过去大战的损失,一方面又要担负未来大战的准备,全世界底被压迫者反而更苦了。”征求函同时肯

定了孙中山先生的历史功绩:“孙中山先生,是中国国民革命的领袖,为国民革命,奔走了四十年。以四十年之经验所造成的种种计划主张,当然可作我们进行中国革命以达世界和平的路径。”孙中山在《遗嘱》中曾言:“余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积四十年之经验深知欲达到此目的,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此征求函就是对《遗嘱》的呼应。征求函呼吁:“我们愿集合同情于中国和平与世界和平者,共同协力发掘此四十年结晶的经验所示的坦途,俾我们可以一直向前。”文后还有研究内容与联系方式。

董亦湘等共产党人的做法,是真正坚持并践行了孙中山“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的殷殷嘱托。

(作者为常州市名人研究会董亦湘研究委员会副会长,本文由董亦湘烈士的外孙丁旭晴先生提供材料。)

鲁迅收藏外国版画

吴吴军

鲁迅是名副其实的我国现代版画艺术运动的开拓者和奠基者,也是中国现代收藏史上著名的版画收藏家。从少年时期开始,鲁迅就对美术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尤其是版画艺术。他也非常喜欢收藏外国的版画,尤其是欧洲的版画,只要见到,他就一定要购买收藏。即使在世界版画收藏家中,鲁迅收藏的版画之多,也是不多见的。

鲁迅收藏外国版画,除了自己尽力收藏以外,还委托朋友帮他购藏。比如,他曾经委托在德国留学的徐诗荃、美国记者史沫特莱、旅居苏联的作家曹靖华等人,帮他购藏德国、比利时等国家的版画,主要是德国版画和苏联的版画。

在德国的版画家中,鲁迅最喜欢的是凯绥·珂勒惠支的版画作品。鲁迅认为,她的作品如《牺牲》《面包》《俘虏》等体现了“深广的慈母之爱,为一切被侮辱和被损害者悲哀、抗议、联合抗拒”。为了收集苏联版画,鲁迅常常要冒着白色恐怖的危险。他收集到的苏联版画作品有克拉甫莱珂的《静静的顿河》木刻插图、比珂夫的《抒情诗集》插图等。

仁心徐特立

张雨

革命教育家徐特立长沙稻田田师范当校长时,有几个学生因打饭时发现菜里有一只死苍蝇,在厨房与工友吵起来,且打碎了一篮碗。工友很生气,坚决要求徐校长挂牌开除这几个学生。

第二天,徐特立真的挂了牌,不过上面写的不是开除学生的公告,而是一首诗:“我愿诸生青胜蓝,人力物力莫摧残。昨夜因为一小事,打破厨房碗一篮?”徐特立的牌子挂出后,引起了学生们的特别关注,打破厨房一篮碗的几个学生看后,悬着的心终于放下了,意识到徐校长已原谅他们了。他们赶忙去向工友深刻检讨,工友此时觉得自己也有错,如果不是因为一个死苍蝇,也不会发生打破一篮碗事件。于是,他们向学生们保证,以后会更加注意食品卫生,绝不会让类似的事情发生。于是,学生和工友握手言和了。学生和工友对徐特立这样矛盾的高明方法都心悦诚服。就这样,一场打碗风波被徐特立的一首小诗轻松平息了。

徐特立历来主张教育学生“不应该用强制的方法,更不应该有粗暴的态度”。他认为“我们的教育是革命的教育,其目的是救国民,不是教顺民,应反对对无理的服从,以及自己没有了解盲从”。在他看来,学生犯错误固然需要批评,甚至惩罚,但这种“惩罚”应是善良的,不能采取“记录档案”或“开除”等激烈的手段,而是以长者的善良告诉他们应该干什么,不应该干什么。他的做法既使学生和工友都受到深刻教育,又给学生和工友一个体面的台阶下,充分体现了他的仁心仁慈。

赵树理改稿

王剑

著名作家赵树理指导别人改稿子,自有他的“绝招儿”。

有一次,青年作者陈登科写了一部中篇小说《替死》,请赵树理把脉。赵树理拿过稿子足足看了十来分钟,然后敏了一下眉头说:“把稿子留下,再留个电话,过几天联系你。”陈登科等了一个星期,未有音讯。他再次找到赵树理,询问稿子的事。赵树理慢腾腾地说:“别着急,还没看完。”接下来,陈登科又跑到赵树理办公室十来趟,每次赵树理都说:“别着急。”最后,赵树理终于拿出了小说,笑着告诉陈登科:“你不要介意我弄脏了你的手稿啊!”陈登科接在手稿一看,每一页上都有红笔做出的圈点。有人打趣赵树理说:“老赵,改篇稿子,你让人家跑了十来趟,这不是折磨人吗?”赵树理点点头说:“你说到点子上了,我就是‘折磨’他。这样,他就会谨慎对待自己的作品了。”在赵树理的建议和帮助下,小说《替死》经过反复修改,最终更名为《活人塘》,由北京三联书店出版发行。一时间,陈登科名声大噪。

无独有偶。1951年秋,赵树理回到自己熟悉的大行山,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房东有个姓李的小伙子,写了一篇《义务帮耕队》,拿给赵树理看。赵树理仔细看了看,对小李说:“你抽时间再改一改,明天拿给我看。”第二天,小李把改了的稿子拿给赵树理看,赵树理说:“有进步了,你再改一遍吧,明天拿给我看。”第三天,小李又把改过的稿子拿给赵树理,赵树理说:“又比原先强了,你再改一遍,相信你会改得更好的。”就这样,小李把稿子改了五六遍。当他把修改后的《义务帮耕队》再次拿给赵树理看时,赵树理笑笑说:“你很有耐心,这回改得很好了,你寄到报社去吧!”

半个月后,小李的稿子在《山西农民报》发了。小李把报纸拿给赵树理看,问:“赵老师,你怎么不把成功的窍门告诉我,光叫我一遍一遍地改呢?”赵树理听后笑着说:“我的窍门只有两个,一个是耐心,一个是修改。”

张治中建言国旗图案的审定

郑学富

1949年6月16日,新政协筹备会决定成立国旗、国徽图案初选委员会,同年7月14日至8月15日在《人民日报》等报纸发布征集国旗图案的启事。消息一出,立刻引起热烈反响,短短一个多月,筹备会就收到了应征国旗图案2992幅。投稿者包括工人、农民、教授、教师、学生、作家及其他自由职业者,从遥远的海外寄来23幅,朱德总司令、历史学家郭沫若、诗人艾青也亲自设计了国旗图案。负责审定新中国国旗的是筹备会下设的第六小组,组长是著名教育家马叙伦,副组长是剑剑英和沈雁冰,其他成员有田汉、郭沫若、陈嘉庚等各界知名人士。经过反复认真地评选,最后从应征图案中,选出比较好的、旗底为红色的38种图案,编成《国旗图案参考资料》,提交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讨论。

前三种图案都是红底,黄星,加一黄条,只是星、条的位置、大小、长短、宽窄不同,但是意义是一样的:红色象征革命,星象征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黄条象征中华民族经济发展的发祥地黄河。在各组讨论中,赞成这种图案的代表超过全体代表的半数。多数代表表示,国旗要大众化,使每个老百姓都能制作。

1949年9月21日晚7时,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平胜利开幕。新华社报道说:“主席台上的布置简洁而美丽。主席台正面悬挂着中国革命领袖孙中山和毛泽东的画像,中间和两侧挂着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会徽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军旗,会场的休息室内挂满了全国各人民团体、各部队和各地的贺幛和锦旗。”

9月23日晚上,毛泽东、朱德要

请程潜、张治中、傅作义、邓宝珊、陈明仁、高树勋等26名国民党起义将领。在交谈中,提到了国旗图案的讨论。张治中建议说,黄条分割红地,如同分裂国家,这不符合将革命进行到底和国家统一的要求,再说用一条红代表黄河,其实许多国家国旗也不一定有什么该国特征,苏联之斧头镰刀,也不一定代表苏联特征,哪一国都可以有同样的斧头镰刀;英、美等国的国旗也没有什么该国的特征。代表国家特征可在国徽上表现出来。他拿着一幅放大的五星红旗的图案

说:“大家都说这个图案好,中国的革命胜利就是在共产党领导下以工、农为基础,团结了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共同斗争取得的,这是中国革命的历史事实。今后还要共同努力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我看这个图案反映了中国革命的实际,表现了我们革命人民大团结。现在要团结,将来也要团结,我看这个图案是较好的国旗图案。”大家热烈鼓掌表示赞同。

1949年9月27日,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根据代表们的意见,对国旗说明又做了进一步修改,正式将国旗定名为:五星红旗。参加政协会议的诗人艾青心潮澎湃,当即赋诗一首《国旗》,发表在1949年9月29日的《人民日报》上:“美丽的旗,庄严的旗,革命的旗,团结的旗。四颗金星,朝着一颗大星,万众一心,朝着人民革命。我们爱五星红旗,像爱自己的心,没有了它,就没有了生命。我们守卫它,它是我们的尊严,我们跟随着它,它引我们前进。革命的旗,团结的旗,旗到哪里,哪里就胜利。”

1949年10月1日,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的开国大典上,新中国第一面五星红旗冉冉升起,高高地飘扬在蓝色的天空中。